



重新思考大學的意義與困境： 談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

林崇熙*

一、異化的焦慮

這幾年臺灣的大學學界充斥著種種不安，包括高教評鑑爭議、重金打造百大的後殖民焦慮、大學數量激增下的品質下降、後段班大學的學士班招生日益惡化、前段班大學的博士班招生警訊頻頻、大學教師迫於升等與評鑑壓力而拼命接計畫與發表 i 式論文，以及從校方到教師做任何事都要以符合量化指標為要。於是乎，從組織高教工會及於教師節至教育部抗議等現象，都表徵著許多大學教師隱然有著被異化的焦慮。

相對於異化的主體是什麼？如果大學僅是為國家與企業服務的組織，就應該依循資本主義市場法則去競逐師資、學生、計畫、經費等，那麼教師就清楚地是大學的雇員，系主任就是協理，院長就是經理，校長就是 CEO，皆向董事會（及股東）負責。此時教師組織工會是理所當然。在市場法則下，關於評鑑、排名、大學生品質、招生、爭取計畫、經費、學費等都不再有合理性問題，各憑本事在優勝劣敗的市場叢林中競爭或合作，尋求最大的生存機會與發展空間。國家需要優良國民或企業需要優秀人才，就與大學銀貨兩訖地進行協議。

上述的異化焦慮就是大學教師對於市場導向的焦慮。這並不是士大夫自命清高的心態在作祟，而是：大學雖然需要因應社會環境而調整，但大學更有著傳承優良文化傳統 / 面對社會重大議題 / 作為社會前瞻良心等核心價值與精神；此即大學有別於補習班或產業人才培訓中心之處，也是各種評鑑、排名、招生、計畫經費等場域所匱乏的，從而使得還懷抱著經世濟民理念的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教授

大學教師感到異化的焦慮。

二、當前大學教育的困境

上述大學教師的異化焦慮不能直接怪罪於國家的干預或產業界的利誘，而須重新檢討臺灣的大學學界長期處於後殖民情境中的主體消亡。戰後承續殖民統治的國家威權主義與白色恐怖下的規訓已然成為潛意識，在本土關懷不可為的情況下，歐美權威是最佳避風港。久而久之，當課堂傳授的理論奉歐美為圭臬、論文率以英文書寫為尚、言必稱歐美大師之名、爭取排名或i式期刊皆以歐美標準為之、以獲取國際組織頭銜來墊高身價等，則臺灣的眾多大學即很輕易地可與臺灣社會無關。此現象與臺灣代工產業的處境具有文化共構性。代工業雖然需有技術競爭力來爭取訂單，但很少能具有主體性與主動性，因而強烈受到國際大廠訂單走向的影響。相同地，臺灣眾多大學因為在後殖民情境中缺乏主體性，就很容易受到國家／產業力量的強烈影響，而被驅使去爭取虛幻的世界排名及自我框限於各種計畫或評鑑的指標中。

蔣勳教授在〈大學〉一文中以一個鄉下老農勞動的眼光來看待大學是：

他們學習高貴的道德，學習如何從內心尊重別人，救助貧困衰弱的人。

他們在大學中，學習如何制訂法律，解決人群間的糾紛。

他們學習對大自然的感謝，知道神的賜予應當公平分配，應當珍惜。

他們用我們勞動生產的時間去思考人類靈魂得救的問題…。

在此眼光之下，如果當前大學忙著搶計畫、搶學生、搶排名，卻無視社會重大議題，也對大學教出來的學生以其「專業」在社會上製造如國光石化、六輕污染、中科圈地搶水等爭議視而不見，更對核電、基改作物、國土保育等風險不聞不問或無能為力，則大學教育的問題就在於忘卻教育的初衷，忘卻大學的本意，更忘卻大學的天命，大學因此而失去了社會支持的正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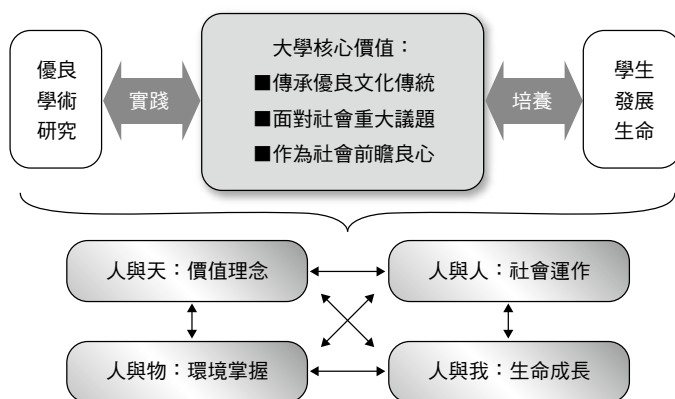
三、重新思考大學教育

大學教育不應異化為搶計畫、搶學生、搶排名，而應努力實踐大學的天命：把握「傳承優良文化傳統」／「面對社會重大議題」／「作為社會前瞻良心」等大學核心價值，為此而進行優良學術研究，從而培養學生有能力面對多變



世事而適者生存，能促進自己／家庭／社會的幸福，並能自我實現（圖一）。由此，大學學術研究的意義不在於發表 i 式論文或得獎，而在於解決社會重大議題及作為社會前瞻良心；大學教育的意義在於讓學生認識自己的特質與發展興趣，培養進入某個優秀社群的知識與能力，並瞭解自己將來所處的社會的文化水平、權力結構與運作方式，以逐步達到做人、做公民，以及做士農工商所需的能力、眼光與格局。為此，教育的內涵即在於教導學生處理個人／組織／社會的一生都需面對的四大面向議題：其一是處理人與天關係之價值理念議題，表現為思想、信仰、宗教、哲學、節慶等。其二是處理人與人關係之社會運作議題，表現為政府、制度、法令、社團、黨派、宗族、學校等。其三是處理人與物關係之環境掌握議題，表現為科學、技術、工程、產業等。其四是處理人與自我關係之生命成長議題，表現為美學、品味、進修、心靈成長、救贖等。此天人物我觀諸面向的綜合成果就是文化。進而，此天人物我觀諸面向的失衡既是社會問題與紛爭的產生，同時相應的導正努力就是文明發展的重要動力。

大學教育的問題就在於沒有把握核心價值來充分回應與培養學生如何處理一生都需面對的天人物我觀諸面向議題。當大學教育（及評鑑）窄化為專業知識等「物」層次的成就時，不但難以回應時代的挑戰及與專業相關的社會重大議題，更會生產出以單一專業知識為尚的專家，以這般的專家來處理複雜社會問題，就會製造更多的社會問題。政府過往數十年不同階段的「拼經濟」作為都衍生出各種社會爭議與問題，即因概以「物」層次的經濟為主導，而忽略了「天」層次的社會正義與價值辯證、「人」層次的公民社會與民主參與，



圖一 大學教育的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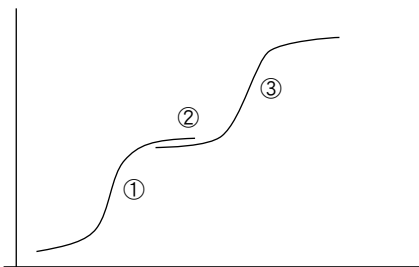
以及「我」層次的安居樂業與美感品味。

四、大學為何需要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

當前許多社會重大爭議都來自政府與專業者以「物」層次的專業來處理兼具「天／人／物／我」四個面向議題的複雜社會問題，此在環境影響評估爭議（如國光石化、美麗灣、中科四期等）、核四存廢、都更圈地、樂生療養院等文化保存爭議案例中尤其明顯。既然問題無法在既有情境得到解決，因此，大學若要實踐作為社會良心的天命來解決社會重大問題，就必須在天人物我文化觀諸面向對現況進行突破。

過往大學談創新不是科技創新，就是設計創意或管理新模式。至於人文社會領域似乎朝向「究天人之境，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努力，很少以「創新」概念來自我期許。事實上，創新之意不在於製造一個前所未有的東西、設計或想法，而在於對既有的天人物我文化觀框架做出突破以解決問題。進一步地，創新要能成功不僅在於提出新構想或新物件，更須經營出創新所需嵌合的新生活方式，方使創新能改變現況與解決問題。準之，以新生活方式與相應的新天人物我文化觀來解決社會重大問題，就是人文創新的旨趣。

古今中外的偉大思想家莫不是人文創新的典範。面對春秋戰國時期的不時征戰與社會動盪，墨家、道家、儒家、法家、陰陽家、農家等諸子百家都提出具有價值理念、社會運作、環境掌握與生命定位的系統性思想，並獲得支持者的社會實踐與持續發展，從而鍛鍊出世世代代足資對話與啓發的經典。然而，近代學術發展愈益分殊專業，也就愈益窄化為「物」層次的知識研究與傳授，喪失了偉大思想家天人物我文化觀的全貌思想格局。縱然是在



圖二 臺灣經濟成長曲線與未來。①來自人文創新，②是現今的結構性困境，需要新的人文創新來開創③。



「物」面向的科技領域，偉大學說如牛頓力學或達爾文演化論，或如當今經濟一片低迷而卻能造成搶購風潮的 iPhone/iPad 系列，都遠遠超越「物」層次創新，而開創出人們的新生活方式。

臺灣四十幾年前的加工出口區是個值得探討的人文創新案例，深刻地改變了人與人、人與土地、人與社會的關係，並開創經濟快速成長。（圖二之①）三十年前的科學園區僅是加工出口區的豪華版，如果抽掉幾十年來每年數十億至數百億的稅賦減免與種種補貼，並清查種種環境污染，則科學園區神話將瞬間幻滅。此即至今政府仍以徵收農地以擴張科學園區來補貼大資本家，不但無法突破產業困境，更激起社會眾怒。如今臺灣經濟發展處於高原期（圖二之②），雖然許多人找不到工作，但許多舊思維產業找不到人，許多新產業也找不到人，表示臺灣產業與社會正處於結構性困境中，故需要新一波的人文創新，才有可能開出新的發展機會（圖二之③）。

五、三元螺旋鏈創新模式

前述每一個偉大思想都源自於思想家面對他所處社會的重大議題，一方面從在地議題與在地脈絡進行人文創新式突破以解決問題，同時，其系統性思想能以社會實踐來檢驗與不斷修正改進；另一方面又不自限於具象案例，而能抽象出普遍性理論，故能跨越時空與世世代代人們對話，才不會有過時或人地不適之憾。這般的在地議題 / 在地脈絡 / 系統突破 / 在地實踐 / 抽象理論等都是人文創新不可或缺的環節與要素。

從古至今，許多知識分子經常將思想與社會實踐結合，不管是出仕施政或如晏陽初般投身社會教育，都可見典型在夙昔。當前的大學環境不必然能讓每個教師都能自身投入社會改革，但卻能以大學 -NGO- 社區居民的結盟合作來進行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此模式猶如電晶體此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科技發明的三元螺旋鏈創新模式。1930 年代 AT & T 有感於電話業務量快速增長及市場競爭，因而希望貝爾實驗室發展新方式來取代不甚可靠的真空管，任務團隊中有理論物理學家與實驗物理學家 John Bardeen、Walter Brattain、William Shockley 等人及材料專家參與。此團隊的運作模式並不是理論→實驗→產品般的線性模式，而是理論物理學家、實驗物理學家、材料專家三者一方面有著各自的問題導向研究，二方面又能相互纏繞地彼此引發新問題，三方面又能相互支援解決問題。此三元螺旋鏈模式中，理論具有指導性、推論

性、預測性與普遍性，但若沒有落實在具體脈絡與事例中，則一切只是天馬行空。當中，材料專家的實務能力與經驗便是具象事例的操作者，也經常是種種奇特現象的發現者，更是實驗科學家不可或缺的夥伴。他們在研究過程間遇到二次大戰，團隊成員多位被徵召到軍方研究單位，進行諸如潛水艇聲納研究，其中獲致的奇特材料現象戰後帶回貝爾實驗室，繼續三元螺旋鏈模式而發明了電晶體，奠定了至今資訊產業的物質基礎。Shockley 等三位科學家亦因而獲得 1956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以此三元螺旋鏈創新模式來看人文創新，即須結合擅長理論的大學師生、兼具組織行動力與多種專業的 NGO（或產業）及實地生活的社區居民。大學之理論有其來自抽象思考的普遍性與指導性，因而能成爲某種思考座標來觀察問題癥結；社區居民的生活最能直接地感受到社會重大議題的威脅與實例，其生活就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實踐場域。介於二者之間的 NGO 通常具有某種關懷領域的天人物我文化觀能力，例如環保團體是基於生態保育的價值理念、具有社會運動的策略與行動力、展現豐富的環境保護知識，以及能於環保事務中自我實現。並不是說大學理論就能指導 NGO 或社區，而是三者各有其志業取向，但又能基於共同的社會關懷而交織合作、相互引發、彼此協助。則學術界將從社會關懷與社會實踐中獲得許多有意義的學術議題，並與既有理論對話，而有機會開展出突破性的新理論；同時，NGO 將能實踐自己的理念，社區居民將能解決威脅生活的重大問題。在三者互蒙其利的社會實踐式成長中，人文創新於焉誕生。

六、對於大學教育的啓示

國科會人文處推動「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從其理念、議題、經費、期程、組成、進行等方面來看，本身就是一個人文創新。因而若各大學仍然以爭取頂尖計畫或教學卓越計畫的「物」層次資源概念來看待此計畫，就還是將自己框限在既有窠臼中而已。此計畫若要有意義，大學就有必要重新檢視當前大學學術的困境及大學教育的問題，並對照到社會重大議題的癥結，從而得到一方面跨越當前學科區分的侷限與界線，一方面全面地進行多元價值辯證、落實社會實踐策略、發展另類適當技術，以及以美感品味來提昇生命層次。可以說，此計畫的成功必須同時在大學內部及社會實踐中進行人文創新，透過這般反身式共構性，才能讓大學提昇到新的境界。